

莊錦農教授的學思路*

謝國斌

興國管理學院通識中心副教授

摘要

本文是一篇傳記性文章，旨在描述與闡釋台大政治系榮譽教授莊錦農老師從體制的順從者到反叛者的學思歷程。文章內容主要包含莊老師的求學、任職、升等等歷程說明，並且介紹了莊老師爲了兼顧批判與生存的特殊反霸權教學方法，最後則是闡述他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貢獻與所扮演的角色。作者以莊錦農教授學生的身份，撰寫此篇文章的目的除了要繼師長之志，與述師長之事外，當然也試圖藉由描繪一位本土政治學者的學思路，來呈現台灣民主化過程中，人們所遭遇之各種政治壓力，以及其尋求解放之道。

關鍵詞：莊錦農、台灣政治學者、台灣民主化

* 本文初稿發表於 2011 年 4 月 23 日由台灣國際研究學會主辦之「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本土人文社學者」學術研討會，感謝論文評論人的建議，也感謝匿名審查者的意見。除此之外，本文的完成要特別感謝莊錦農教授接受訪談與提供相關的文獻資料，也要感謝提供訪談資料的學長姊與學弟妹。雖然學長姊與學弟妹多表明可以用真實身份示人，但基於研究倫理與行文的一致性等考量，本文還是決定將此部分的資料以匿名方式處理，尚祈學長姊與學弟妹的諒解。

壹、前言

替他人寫傳記是我未曾想過的問題，而替自己的老師寫傳記更是想都不敢想像。一方面，以過去所受過的社會科學學術訓練來說，寫論述性的論文還是比較習慣，而傳記式的書寫則是全新的嘗試。另一方面，在我的社會化過程中，「老師」這個角色給我的形象是權威的，因此要替此權威的人物書寫傳記，內心的感受以戒慎恐懼來說還不足以形容。

莊錦農教授（以下簡稱莊老師）桃李滿天下，遍佈在社會各個領域。若以指導撰寫碩博士論文研究的學生來看，從 1992 年莊老師首度招收指導學生起（詳見第三節），迄今也共有 43 位碩博士學生出自莊老師門下。本人忝為莊老師的門生之一，與其他學長姊的成就與能力相較，實不足以擔此重任。因為，從求學時期，我即感資質駑鈍，常無法有效即時瞭解莊老師的見解。因此，要我以所見所聞來詳實記錄莊老師的學思路，以及他對台灣民主化的貢獻，深恐會疏漏百出，力有未逮。不過，既然接下此任務，也只好勉力而為，盡自己最大的努力來完成此一任務。

為了避免對莊老師的描繪有所謬誤，本文的撰寫還是以學術的論述方式為之，並採取質性的途徑（*qualitative approach*）。一方面盡量以描述的方式，來呈現「我」對莊老師的印象與瞭解；另一方面也輔以對莊老師本人的訪談，以及若干曾經受教於莊老師的學生的訪談¹，來補充相關背景資料的不足。

必須強調的是，既然這篇文章以質性途徑出發，而且是從「我」個人的觀點所撰寫，則其中的內容無論是描述性的或評論性的，都無法避免個人的偏見與可能的謬誤。而且，就行文的方式而言，也會使用到非正式以

¹ 除了非正式訪談幾位曾經於大學部修過莊老師的課程的學生外，正式訪談的部分以莊老師所指導過的碩博士為對象。根據國家圖書館碩博士論文系統的資料，莊老師指導過的學生有 42 名；加上在 2011/6/30 博士口試通過一人。基於時間的限制，我僅以網路搜尋的方式找尋電子郵件地址，共找到 13 筆資料。而後我以電子郵件寄送標題為「我所認識的莊錦農教授」的半結構式問卷，共有 5 人回覆。

及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 (Creswell, 1994)。在文章結構安排部分，既然本文章的主題是要呈現莊老師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學思歷程與貢獻，那麼本文的內容安排除了必須介紹莊老師的學思歷程外，也將探究其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貳、莊錦農教授學思路的型塑——從順從者到反叛者

從 1993 年秋修讀了莊老師所開設的「研究方法」開始，迄今與莊老師已經相識近二十年了。然而，莊老師的身家背景對我而言一直是個謎，相信對大多數他的學生而言也一樣，因為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個極其低調的師長，沒有必要也不好意思去詢問老師的相關背景資料。不過，既然要寫莊老師的事蹟，除了努力蒐集有限的文獻資料之外（例如莊老師的著作發表、網路訊息等），我也只好硬著頭皮約老師出來進行訪談。

2011 年 1 月 21 日星期五下午，趁著上台北開會的機會，我以訪談者的身份訪談了莊老師。除了他的背景資料之外，我最好奇的部分是他是如何進入台大政治系？又如何以一個反對派人士的角色在台大政治系屹立不搖？當然，以一個曾經受教於他的學生，我也很好奇何以他的教學風格是如此的「隱晦不明」？於是，我乃以他的求學、任職、教學等歷程來作為訪談主軸。

根據 1990 年代初期的通訊錄，莊老師生於 1939 年 4 月（今日的通訊錄已經少有這麼詳細的記載了）。莊老師的故鄉位於台南學甲的鄉村，幼年家境貧困，求學歷程艱辛，不過他的成績一直都相當優秀。高中聯考時，他考量到高雄有親戚家可以借住，可以節省住宿的開銷，因而捨棄離家較近的台南考區，選擇了高雄考區，並且考上了高雄中學。後來由於經濟的因素，莊老師被迫休學回到學甲故鄉耕讀一年，但他並沒有因此放棄繼續升學的機會。在不增加家庭負擔的情況下，他選擇就近就讀當地的北門中學來繼續完成高中學業。

1959年莊老師考進台大政治系。對於南部鄉下來的台灣囡仔來說，在沒有政商背景下，讀政治系其實是一條「萬徑人蹤滅」的道路，並不受到一般人的認可，也非莊老師的第一志願。但是，既來之，則安之，以今日的眼光來看，莊老師在政治學界也開啓了一片天。莊老師唸大學時，台灣正處白色恐怖的戒嚴時期；而在1960年莊老師念大二的時候，台灣發生了轟動一時「雷震事件」，讓人感受到威權政府無法接受異議人士存在的現實。

當時雖然只是二十出頭的大學生，但白色恐怖時期特務橫行的環境，已讓念政治系的莊老師感受到實際政治運作的可怕之處。根據莊老師的描述：

由於二二八事件時，很多人跑到南部鄉下避難，因此我們這些從鄉下來的人就特別容易受到特務的注意。記得當時住在宿舍時，教官進駐宿舍，很多人被抓走。而且宿舍裡面也住有特務，甚至有些人門口還擺放著蔣介石的肖像。

因此，即使當時的環境已孕育出他批判的思維，但卻淬鍊出他低調以對的內斂處事態度，以及不從事政治實務操作的人生哲學。

在白色恐怖的時代裡，莊老師雖然內心對於政治時局有所不滿，但在「求生存」的前提下，當時的莊老師也與一般平凡的學生無異，只能表現得「很乖」，但內心批判的種苗卻逐漸地發芽。1963年台大政治系畢業後，莊老師進入軍中服役，役畢後繼續進入台大政治系念研究所，並於1967年順利兩年畢業取得碩士學位。隨後莊老師即以「優異的成績」應聘為台大政治系助教，於1970年升等成講師，並於翌年留職停薪遠赴美國深造。1974年返國後，莊老師開始在台大政治系大學部任教，隔年（1975年）即升等為副教授。

從研究所畢業、應聘為助教、升等成講師、留職停薪深造，到升等為副教授，總共才花了七年的時間，這段期間的莊老師似乎相當順遂，而我認為其「順利」與「很乖」的行為有一定的關連。不過，莊老師的「乖」

行為其實與當時的政治環境有密切的相關。除了白色恐怖的持續之外，在號稱自由學府的台大校園裡，這段期間也接二連三發生一些震撼社會的事件，包括：(1) 1964 年的彭明敏事件：時任政治系主任的彭明敏教授因為和學生共同起草『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而被判刑八年（陳儀深，無日期）。(2) 1960-1966 年的殷海光事件：任《自由中國》主筆的台大殷海光教授，因在社論上發表批評政府言論，因而在 1966 年遭到台大解職（維基百科，2011）。(3) 1972-1975 「台大哲學系事件」：這段期間由國民黨特務與職業學生在台大哲學系內對自由派學者進行一連串的整肅行動，迫使陳鼓應等多名教授遭到解職，而哲學系更因而被停招一年（周俊宇，無日期）。

在這樣險惡的環境裡求學任職，若沒有「乖」表現，除了可能立刻遭受掃地出門的命運外，更可能會招致牢獄之災。在統治者強大的外力壓迫下，迫使當時大多數的人看起來都是體制的遵從者，莊老師也不例外。而莊老師優異的學業成績，更使其成為台大政治系可招攬的師資人才，因為從當時政治系守門人（gate-keeper）的觀點來看，「優異的學業成績」代表統治者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的成功，足以讓莊老師進階成為社會化別人的代理人，這也或許足以解釋莊老師何以能進入台大政治系任教。

不過，從 1975 年升等副教授到 1983 年升等教授，卻讓莊老師足足等了八年。以現在的眼光來看，八年看似一個「正常」的年限，但是以當時二、三年即可升等的時代而言，八年已是一段漫長的歲月。這段期間的「不順遂」，應與莊老師開始授徒而顯露其批判性有關連。

從表現得「很乖」到逐漸展露批判，進而成為批判思想或民主種苗的散播者。以社會學者墨頓（Merton, 1968）的理論來看，1975 年以前的莊老師的「乖」表現，或許可歸類為體制內的「順從者」（conformist）。這段期間莊老師沈潛自己，默默地遵從統治者所允許的社會規範，因此這段期間的際遇尚稱順利。然而，從 1974 年他開始開課教書以來，情況似乎有了變化。即使當時台大哲學系整肅事件仍在進行中，而莊老師也力守低調以求生存，並且在課堂上盡量地虛無飄渺，以避免「被擰出去」（莊老

師語)。但是，莊老師也表示：「雖然說話比較抽象，但上課時對學生會多講一些」。或許「我口說我心」，他腦袋裡批判性的思維有意無意中從「多講一些」當中洩漏出來，使得他一方面開始被統治者視為偏離者（deviant），而他自己也逐漸浮現真正的自我（self identity），成為在統治者所建構的社會規範下的反叛者（rebellionist）。

政治學系雖被許多人視為是研究政治科學（political science）的科系，但也被許多人認為是教導如何統治的科系（Department of Government）。台大政治系是國內政治系的最高學府，自然也是統治者培訓統治人才的大本營。換句話，政治學系這個培訓統治人才的機構當然是由統治者所掌控，而政治學系的教師理當成為貫徹統治者意識型態的執行者。在這樣的環境下任職，究竟是何種滋味？又該如何自處？莊老師自謙地說：「只是為了求生存」。為了「求生存」，莊老師低調行事，潛藏自己而當一個體制的「順從者」；但是，為了對得起自己的良知理念，他也避免參加任何可能會出賣自己靈魂的會議與活動。特立獨行的行徑和與眾不同的教學風格，使他成為學生口中台大政治系的「邊緣人」或「孤鳥」。

當孤鳥，除了為道不同不相為謀外，當然也不想讓別人窺探其內心世界而惹禍上身，包括來自同事與學生的窺探。他說：「同事來接觸我時還是會覺得毛毛的」，「而學生會主動接近的問題也比較大」。自我防衛的風格除了強化他孤鳥的形象，也使得有些學生會認為莊老師「不太理學生」或「不太容易親近」。在職場上，行事低調的風格除了被視為偏離者，使其升等教授案面臨較多的挑戰外，其他諸如開課事宜也遭遇到許多困難。例如僅能開授選修科目或非主流的必修課，而核心的必修課如政治學、比較政府等都無法在本系開設。而被視為孤鳥的莊老師所開設的課程，除了無特別意識隨便選的人以外，大概也只有相同背景或意識型態的學生會「願者上鉤」，修習莊老師所開設的選修課程。依照時間順序，莊老師在大學部曾經開設過的科目主要有：政治發展、量化研究、政治心理學、大眾媒體、研究方法等。

不欲他人窺探其內心世界的低調風格，除了型塑出他職場上孤鳥的形象外，也展露在莊老師的學術著述風格上。在學術著述方面，莊老師自謙「喜歡讀書，不喜歡寫作」，但他也表明「怕寫出來會有麻煩」。以公開發表的論文著述來看，根據國家圖書館「台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的資料，從 1974 年莊老師開始開課任教以來，迄今「僅有」13 篇期刊論文。以當代的學術標準來檢視，這樣的數量或許會令人訝異；但更令我訝異的是，莊老師「非公開發表」的著述卻也有厚厚一大疊。

爲了更深入瞭解莊老師，在訪談之前我也央請莊老師帶幾本著作借我參閱，當我在會面地點等待時，只見他老人家抱了厚厚一疊的書緩步前來。除了一些曾經出版過的期刊論文外，更多的是裝訂成冊的專書。例如：《我國台灣地區社會動員與政治穩定的研究》（1980）、《多國公司與國際政治》（1981）、《國際政治中相互依靠概念的分析》（1982、1983）、《國際關係的知識論》（2003）。這些書雖然都請印刷廠印刷裝訂，但並非由具有公開發行的出版社正式出版，更沒有今日學界普遍認爲需要的 ISBN 條碼。這或許是學界舊式的發表模式，但當我詢問莊老師何以不找家出版社正式發行，以便讓著作有更大的流通性，以嘉惠更多讀者時，莊老師只淡淡地說：「自己出版就好了」。而目前莊老師剛完成一本已經醞釀十多年的《政治學》手稿，當我努力奉勸他找家出版社出版時，他還是堅持只要自己出版就好了。

「不是沒有著作，而是沒有正式公開發行」，這就是莊老師的風格。莊老師表明，寫著作的目的是爲了「對得起自己」。不願正式公開發表，當然會讓人覺得遺憾。有位學姊即對莊老師的過度低調表示可惜，她說：

莊老師太低調啦，而且他的啟蒙方式，要有慧根的學生才能頓悟。這樣對於台灣民主的發展，在教育傳承的部分，就顯得緩不濟急了。

不過，有另一位學長則對莊老師的這個風格有另一番解釋，他說：

莊老師低調有原因，雖然我們都覺得，他似乎太多慮了，但這就是他的風格，不會突然改變。就像一些好的餐廳會拒絕媒體採訪，他

覺得，識貨的人來買就夠了，不然買回去不能真正看懂也沒有用處。密笈是不能外傳的，免得被人學走。再說，一部有 ISBN 的著作也就是自願接受國家監控。莊老師既然想煽惑別人，當然不能受到注意。莊老師的知音很少，太被注意不利於他的天命。只要能買到他的書就好了，不要在意形式，也不要廣為流傳，免得被人誤讀而遭大禍，像 Carl Schmitt 那樣。

雖然我還是期待莊老師能夠將其最新著作正式公開發表，以饗更多讀者，並發揮更大影響力。但從他不欲他人窺知其內心世界的處世風格來看，其結果是可以預期的。而從一個學者選擇封閉其內心世界的情況來剖析，其實也映襯出莊老師在型塑其學思歷程時所遭遇的強大結構壓力。此壓力之大甚至讓他在今日已被許多人稱為民主自由的台灣，仍然保有白色恐怖時期的行為慣性。不過，一個具有批判思維，試圖「煽惑」別人或「解放」別人的人，若不透過著述發表來作為反霸權（counter-hegemony）的平台，也需要有其他管道來讓他進行政治傳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我想在大學殿堂的教學，就是他作政治傳播，進行反霸權行動，與重新社會化（re-socialize）他人的最佳舞台。對莊老師而言，努力維繫住這個戰略位置似乎比論文著述更重要；直接面對學生散播批判的種苗，似乎也比較直接且有趣。

為了更完整呈現莊老師在教學方面對學生的影響，以及對台灣民主化的貢獻，以下將另闢一節，以進行更詳細的說明。

參、莊錦農教授的教學風格——獨釣寒江雪的智者

如前所述，若要說莊老師對台灣民主化的貢獻，或許不在著述上，而應該是在課堂上的反霸權政治傳播，與對學生思想的重新社會化。不過，誠如前面所論及的低調風格，課堂的授課方式也是認識莊老師的重要途徑。而「孤鳥」、「避免他人窺探內心世界而惹禍上身」、「批判性思維」這

幾個概念，也許可以描述並詮釋莊老師的教學風格。一言以蔽之，「獨釣寒江雪」是其教學風格與理念的寫照。其意義綜合了姜太公「願者上鉤」與柳宗元「獨釣寒江雪」的意涵²。在受統治者所操控的政治系裡任教，環境的險惡猶如冰寒的雪地；孤獨的心境也可比擬為「孤舟蓑笠翁」；而不滿時局卻又想有反霸權的行動，只好透過課堂上的「釣魚」進行；但爲了避免被窺知內心而惹禍上身，也只好當個如姜太公般的智者——「願者上鉤」，以「隱晦不明」的風格來上課。

不過，這種有智慧的「願者上鉤」、「隱晦不明」，或如其他學長姊所說的「頓悟式」、「放牛吃草式」、「虛無飄渺」、或「蘇格拉底詰問式」的教學法，並不是每個學生都能體會或欣賞的，尤其對一個十幾二十歲出頭的年輕學子而言，更是會感到困惑，往往無法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但在白色恐怖的時代裡，如莊老師所言，作爲一個「沒有組織背景」的獨釣者而言，若上課時不以有智慧的方式抽象進行，隨時都會被掃地出門，屆時連垂釣的戰略地位都不保，台大哲學系事件是最好的例子。

莊老師對其江雪中的垂釣行爲表示：

當時壓力很大，不敢講到台灣的來，也怕影射當局，因此 suppose 大家都聽不懂，若有一兩個能懂就好了。

我想，或許授課當時，真的只有一兩個人能真正領悟到莊老師所欲傳達的思想，但他課堂上帶給學生的「挫折」、「困惑」、「震撼」，必定在學生內心造成衝擊，也無形中埋下了更多批判性的種苗，數年後有開花結果的相信不在少數。

莊老師的江雪獨釣可分成研究所與大學部兩個場域。以研究所而言，1992年『刑法』100條修正前，莊老師沒有指導過任何研究生。因爲據莊老師表示，以前的論文口試委員必須由系主任指定，因此在無法確保自己

² 由於個人才疏學淺，也無法脫離過去被社會化經驗的影響。希望這樣的比喻不會引起任何不愉快的聯想，也希望莊老師能見諒。

所指導的學生能順利畢業的情況下，在此之前他不敢收學生來指導。這一點似乎也讓一些早期的學長姊對莊老師有所誤解，認為莊老師「不太愛收學生」。不過，從 1992 年起，當指導教授擁有選擇口試委員的主導權後，莊老師便開始招收門生，直到退休為止。

「爲何會找莊老師指導論文？」這是我寄出去的訪談題綱裡的一個重要問題。所得到的答案主要包括：「莊老師很好相處」、「莊老師尊重學生，會讓學生自由發揮」、「與莊老師投緣」。我想，這應該也是今日許多研究生找指導教授的重要考量之一。事實上，每個人的想法都不盡相同，人與人之間的磁場也因人而異，這個問題的答案應該也是因人而異。以一個徹底被「尊師重道」這個倫理道德所社會化的我來說，我大概不敢稱任何一位老師是「和藹親切」的，因為從我的觀點所看到的都是傳道、授業、解惑的嚴師。因此，當我在台大政治系這個嚴肅的科系就讀時，對當時的我來說，每個老師都是神秘莫測，甚至是不可接近的，當然也包含莊老師在內。

不過，在政治系眾多的老師當中，何以我會在唸碩士班時會找莊老師指導，即使我在大學時期只修過莊老師的「研究方法」這一門課而已？當時的我大概只是憑直覺行事，除了「會讓學生自由發揮」這個原因外，現在想想應該與莊老師的「平凡」與「樸質草根」特質有關。因為，在課堂上，莊老師會叫我們自問「我是誰？」，對於學生的朦朧無知會表現出「生氣」的樣子，可是生氣之後又會問學生「你們聽懂了嗎？」；更重要的是，當無知的學生認為學期成績會不甚理想時，最後竟能得到一個意想不到的好成績。

這裡所謂的「平凡」，指的是莊老師在政治系嚴師群裡表現的最像一個「凡人」，而不像是高不可攀的「神人」。他有喜怒哀樂的情緒，但對學生卻又很寬容。而所謂「樸質草根」的特質，對我來說是一種：直覺的、似曾相似的、親切的特質。會讓我這個來自南部的庄腳囡仔產生了一種特別的親切感。或許這就如社會心理學所說的，這是一種讓異鄉遊子或特質相近的人，「自然而然」產生的一種原生連結（*primordial attachment*）。

不過，嚴格說來，此處所說的「自然而然」其實還是存有再社會化的痕跡。若無當初上莊老師的課時所接受到「我是誰」的啟發，讓我開始意識「我是誰」並不是一個單純的問題，而開始認真思索身份與認同這個問題，當時的我大概還只是一個矇矇懂懂，而不知自己是誰的人。坦白說，當時的我並沒有真正領悟這個問題，但是莊老師的啟發至少讓我警覺到，我的身份與認同似乎與許多同學及師長不同。而這個自我覺識，也開始讓我去尋找相似的連結（kin connection）。這種類似親屬選擇（kin selection）的過程，對學生來說是自我認同的確立過程；但對於莊老師來說，某種程度也是課堂上所散播的批判種苗的收成。

從個人的經驗來看，莊老師這種「獨釣寒江雪」與「願者上鉤」的反霸權政治傳播模式，對於植下批判思維的種苗，與重新社會化被禁錮的腦袋，皆有相當的成效。即使在受教的當時，多數學生可能會覺得很「困惑」，甚至「不能接受」。

究竟莊老師是如何上課？風格又是如何呢？如前所述，在莊老師欲保持低調，明哲保身的前提下，他必須「說話比較抽象」，但是當他又想對學生「多講一些」時，往往就變成了「多講了一些比較抽象的話」。這樣的授課方式，對於聯考一路過關斬將，被外界認為「聰明」的台大政治系學生而言，其衝擊是在所難免的。誠如某位學長所言：「莊老師的教學方法屬於頓悟派，沒慧根的人只好以為自己聽得懂。當時的我應該也是這樣。」除了自以為聽得懂的人外，當然也有些意識型態根深蒂固的人無法接受這種解放思維的教法，尤其對那些「成績優異」的同學尤然。

以我自己上過莊老師的課的經驗來看，大三的必修課「研究方法」，是我大學時期唯一修過的莊老師的課。課堂中印象最深刻的是，老師常問我們要知道「我是誰？」。當學生的回答令人不甚滿意時，莊老師還會詢問「你確定嗎？」「是誰告訴你的？」。可是當學生還是無法回答出令莊老師滿意的答案時，尤其是顯然受過黨國教育所洗腦過的答案時，誠如某位學長所言，莊老師會「面露無奈的表情」，進而導致學生的緊張。

「研究方法」的課教學生認識「我是誰」，以一般的研究方法課程來看，也可能會覺得有點突兀。因為，研究方法不外乎談論如何蒐集資料，如何分析資料；談的方法應該是諸如統計、實驗、訪談、觀察、田野調查、內容分析等等。所幸我至今還保有當時上課所抄的筆記，在仔細翻閱筆記並回顧過去的上課經驗後，我認為其實莊老師教的比較像是「政治分析的方法」，而且是採取社會科學裡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的途徑。

批判理論涉及本體論、知識論、與方法論上的基本哲學假定。在本體論上，批判理論的學者一反實證主義（positivism）與後實證主義（post-positivism）的論點，認為人類社會並沒有所謂客觀中立（value-free/neutrality）的單一事實存在；相反地，他們認為所有的事實都只是「虛擬事實」（virtual reality），都是受到政治、社會、經濟、族群、宗教、階級等社會因素的塑造而成。而在知識論上，研究者在進行研究成果發表時也無法自外於個人的社會背景。例如，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對於政治人物的歷史功過之評價往往就會不同，沒有所謂的客觀中立的知識可言。就方法論而言，批判理論者強調要用邏輯辯證法（dialogic/dialectical）的方式，來解構被建構出來的虛擬事實，所以他們認為知識的本質不是找出事實，而是要具有超脫表面事實的歷史洞察力（historical insight），並以重新社會化的方式來解放被禁錮的頭腦，讓人們從錯誤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中解放出來（Guba & Lincoln, 1994）。

替人貼標籤不是我的習慣，也有謬誤的風險。不過，若貼標籤可以幫助讀者理解，這樣的作法或許無傷大雅。況且，我還記得當時上莊老師的課時，莊老師還曾經爲了不知道該給學生貼什麼標籤而慨嘆：「我真的不知道要給你們貼什麼標籤才好！」。因此，希望莊老師對於這個標籤不會介意才好。當批判理論途徑與抽象的頓悟式教學法結合在一起，會產生什麼效果呢？火花四射應該是免不了的。

在 1993 年我修莊老師的課時，即使當時已經解嚴六年，而令人恐懼不安的『刑法』100 條也已經修正了一年，學術思想也逐漸進入百家爭鳴

的狀況。然而，莊老師還是保有他那抽象頓悟式的教學法。面對年齡未滿 20 歲，心智未臻成熟，且長期受到國民政府文化霸權洗腦的莘莘學子，再加上台大政治系趨向保守的結構環境，莊老師欲以一己之力把學生從過去的「錯誤意識」解放出來，並對學生進行重新社會化的工程並不是很順利。

雖然人生來如白紙，但當時的我們其實已經是被深深染上顏色的人。宰制群體在我們腦袋瓜裡所建構的文化霸權早已盤根錯節（縱使還未根深蒂固），這對於「用功讀書」、「學業成績優異」的台大學子更是如此；成績愈好的人，代表我們所受的黨國體制教育的影響愈深，也距離原先的自我愈遠。換句話說，當時的我們已經某種程度失去了自己原本的身份認同（identity），而使用宰制群體建構在我們身上的身份認同。

因此，當莊老師要我們重新認識「我是誰」的時候，當時的我們只知道「我就是我！」，哪有「我是誰」的問題，甚至有人會質疑老師故意問「笨問題」來刁難學生。因此當時的同學們普遍都很難接受莊老師的教誨，甚至有同學為此感到羞怒；而很「乖」的學生如我輩者也只能假裝聽懂，並無法真正領會莊老師所欲傳達的思想。整個學期下來，同學們普遍的反應是「不知所云」、「沒有收穫」。

換句話說，莊老師想要以抽象的教學法，試圖解放並重新建構這群學子的腦袋瓜真是艱辛的大工程。這也難怪莊老師每講到激動處，總會慨嘆：「台大政治系國關組的學生很 stupid！」，那種「恨鐵不成鋼」或「朽木不可雕也」的心情，現在回顧起來言猶在耳。值得慶幸的是，那種批判思維的種苗應該有成功植入不少人的腦袋瓜裡。而隨著政治環境的變遷、隨著知識與年齡的增長，我相信有越來越多的莊老師的學生可以體會到莊老師當時的苦心。若以前的筆記還留著的話，找出來翻一翻或許會有一番新的體悟。

綜言之，莊老師當時是以批判理論的觀點，試圖讓學生從長期的黨國教育文化霸權中解放出來，好讓學生們認清楚真正的自己是誰？並且讓學生認知到在政治學領域裡，知識、理論、研究的生產與使用，並不是客觀中立的，而是受到權力的建構。因此，就我認識的莊老師而言，與其說他

是台灣「民主化」的推手，毋寧說他是一個批判種子的散播者。莊老師給我最大的啓發是要我們知道「我是誰」；但莊老師是「誰」呢？若要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給他一個定位，我認爲：他是本土的，批判性的，反霸權的，而且是站在弱勢一方的人。這也是多位學長姊共同的看法。

肆、結語

今日的台灣已經享有一定的民主成果，即使人們對於我國民主的程度到哪裡還有不同的見解。從威權到民主，民主化的過程非一夕之間即能達成。究竟「誰」對民主化有貢獻？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其解答也往往會因政治立場而有所不同。不過，如果民主化是統治群體鞏固其統治地位與被宰制群體的反抗所產生的政治結果，那在掌控權力者不會輕易放棄既得利益的前提下，或如莊老師所言：「政治上是沒有人會自動放棄權力」的情境下（摘自筆者在 1993 年的筆記），來自被宰制群體的反抗對民主化其實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尤其在移民者宰制的社會（migrant superordination）更是如此（Lieberson, 1961）。

從學理上來看，在移民者宰制的社會，由於外來政權缺乏統治的正當性，因此其往往必須先動員軍事等物理權力（physical power）來鎮壓本地人的反抗，才能穩固其初期的統治，而軍事鎮壓所帶來的反彈常常以軍事革命收場（Lieberson, 1961）。不過，從台灣政治變遷歷程來看，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以及之後的白色恐怖統治，並沒有帶來直接的軍事革命，反而相當有效地威嚇了大多數的被宰制者。從人類的革命史來看，軍事鎮壓的確能有效嚇阻大多數被宰制者的反抗，但仍有些抱持價值理性（value-rational）的人，是寧可犧牲性命也在所不辭的，這些人即可能成爲引燃革命或民主浪潮的火苗。

當然，統治者也非省油的燈，在軍事的鎮壓下，對於被統治者使用經濟權力（economic power），施予若干經濟上的小惠也足以使被統治者噤口

或滿足。例如 1949 年開始的土地改革政策，在外來統治者從接收的土地與大地主的手中，大方地進行「公地放領」與「耕者有其田」等政策。從大多數人的需求層級（*hierarchy of needs*）來看，經濟上的滿足至少能暫時消彌其對統治者正當性的疑慮。當然，除了身體的禁錮、經濟的籠絡外，意識型態權力（*ideological power*）的動員是統治者鞏固其地位的上層結構（*superstructure*）。因為意識型態即是一種思想，更是一種信仰（*belief*），其所產生的力量猶如馬克思所說的宗教一般，不但能讓被統治者產生錯誤意識，甚至也能產生如鴉片煙般的麻醉效果，讓被宰制者忘卻痛苦而「甘於」繼續接受統治（*Tucker, 1978*）。

在統治者使用物理、經濟、意識型態等權力來鞏固其統治的情境下，我們所能想像的是統治者的高枕無憂，與被宰制者的噤聲、順從、或被吸收成爲統治階層的代理人。然而，從台灣政治變遷的歷史事實與成果來看，反抗的勢力與反霸權的力量是一直存在的。但面對統治者諸多統治權力的施行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作爲，採取的策略也不盡相同。最悲壯的可能是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先烈，這些人足以被稱爲「烈士」，因爲他們用自己的性命來維繫民主運動的火苗。也有些人選擇走體制外的抗爭，直接以行動挑戰統治者的權威。當然也有人選擇走進體制內，試圖進行體制內改革；不過究竟其爲被宰制者的臥底？還是統治者的代理人？其歷史定位或恐仍會有爭議。誠如莊老師上課時要學生所思考的問題：「國民黨如果不好，就應該加入國民黨改造他，這個論述有何奇怪之處？」（轉引自某學長的訪談資料），顯然莊老師並不認同這條路徑。

在革命先烈等領航者之外，我們也不宜忽略其他看似平凡的智者或勇者，他們在明哲保身與散播民主種苗間尋找平衡點。選擇明哲保身，不阿諛逢迎成爲統治者的代理人，這勢必讓其人生之路多了些坎坷，但他們卻也伺機默默地散播民主的種苗，莊老師即是這類型人物的典型。其努力雖然沒有立竿見影，貢獻或許也無法量化，但其所散播下的批判與民主種苗，應該已經有相當的收成了，誠如多位學長姊所言，他們現在的寫作論述風

格深受莊老師的影響。以此次的研討會主題「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本土人文社會學者」來看，真正隱身於學界來散播民主種苗者，都是平凡卻偉大的勇者。

當低調以對的學者，其學思歷程卻要被公開地檢視，這是一件矛盾的事。不過，若此資料的公開能讓人們更瞭解台灣的民主化歷程，甚至是其對台灣民主化的貢獻，進而受到其精神感召，應該也是美事一樁。「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本土人文社會學者」研討會的醞釀，據悉已超過一年的時間。不過，若以 1987 年解嚴這個重要民主化開端起算，2011 年才舉辦這樣的研討會算是有點晚了。

附錄 1：莊錦農教授大事記

年代	大 事 記
1939	出生於台南縣學甲
1959	畢業於北門中學，考進台大政治系
1963	台大政治系畢業
1965	退伍，就讀台大政治學研究所
1967	台大政治學研究所畢業，碩士論文《美國聯邦財政補助制度之研究》；以「優秀的成績」應聘為台大政治系助教（1967-70）
1970	升等為台大政治系講師（1970-75）
1971	留職停薪，赴美國紐約州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進修（1971-74），並於紐約結婚。
1974	返國述職，回校任教。
1975	升等為台大政治系副教授（1975-83）
1983	升等為台大政治系教授
1993	首位指導研究生畢業，後來總共指導 42 名研究生
2004	擔任台灣國際研究學會副理事長（2004-2008）
2008	擔任台灣國際研究學會理事長（2008-迄今）
2009	台大政治系退休，受聘為榮譽教授

參考文獻

- 周俊宇，無日期。〈台大哲學系事件〉《台灣大百科全書》。台北：行政院文建會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6005>) (2011/6/9)。
- 陳儀深，無日期。〈彭明敏事件〉《台灣大百科全書》。台北：行政院文建會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3876#>) (2011/6/9)。
- 維基百科，2011。〈殷海光〉(<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E%B7%E6%B5%B7%E5%85%89>) (2011/6/9)。
- 謝國斌，1993。〈上莊錦農老師課筆記〉。
- Creswell, John. W. 1994. *Research Design: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 Guba, Egon. G., and Yvonna. S. Lincoln. 1994.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 Liebertson, Stanley. 1961. "A Societal Theory of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6, No. 6, pp. 902-10.
- Merton, Robert K. 1968.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 Tucker, Robert. C. 1978. *The Marx-Engels Reader*. New York: Norton.

The Academic Life Course of Professor Chin-Nung Chuang

Kuo-Pin Hsieh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Hsing-Kuo University of Management, Tainan, Taiwan

Abstract

This is a biographical article that aims to portray the academic life course of emeritus professor Chin-Nung Chuang of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e main themes outline Professor Chuang's academic life course from being a student to a scholar in the field of political science, especially the course how professor Chuang developed his critical political thought and survived as a dissident scholar under an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context. As a student of Professor Chuang, I not only mean to loyally depict Professor Chuang's achievement as an educator and a political scientist, but I also try to highlight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aiwan. Moreover, by illustrating Professor Chuang's case, I also intend to show people how a rebellionist intellectual accommodated and survived under a harsh political environment.

Keywords: Chin-Nung Chuang, Taiwanese political scientist,
democratization of Taiwan